

周人的興起及周文化的基礎

許 倬 雲

一、關中新石器時代文化與西周文化時之新發現

周人在征服關東的殷商王國以前，是以後世所謂『關中』爲地盤的，關中是今日陝西省的渭河涇河流域一條長約三百多公里的河谷盆地，夾在秦嶺與北山兩條山脈之間。

在討論西周的起源以前，我們也該先討論關中地區的底層文化：因爲這些底層文化正是周文化發生前這個地區人類創造的業績，無論周人來自何處——下文對此將有論到——這個文化正是周人祖先進入關中地區時必須協調的土著環境。

對於關中史前文化遺址作普遍而系統化考察的工作，石璋如氏的工作爲最有參考價值，在民國三十二年一月至九月間，石氏在涇、渭、雍、水諸流域，考察了六十六個遺址，石氏認爲其中大都爲彩陶遺址，並有好幾處可能即爲周人舊都。關於周人舊都的確切地點，不在本文討論之列，然而石氏據其考察心得，把這些遺址的地形歸納爲九類：(一)溝圈泉源；(二)一山三水；(三)河濱台地；(四)原邊灣嘴；(五)泉邊溪旁；(六)雙流交會；(七)河濱灣嘴；(八)山脚溝圈及；(九)沼旁渠濱（註一）。

這些地形說明了關中史前聚落對水源的依賴，而有些遺址的地形不可能有極豐的水源，也正相對的說明了聚落不必甚大。

不幸石氏在初步考察後，未能再有機會從事實地的發掘，以致報告中的描述不能使讀者對於關中史前文化的全貌的瞭解有所鑒足，最近十多年來，考古學家在關中地區繼續工作，對於關中史前文化的演變有了更多的資料，若以早期——仰韶文化的遺址來說，關中地區經過勘察的有四百多處，其中不少並已有了相當規模的發掘，這許多遺址的地形，證實了石璋如氏的發現，都在水源便利的河濱，或爲沿岸土丘，或在馬蘭階地上，至少也在泉源附近。而最繁密的分佈爲支流與主流匯合的地方。整個涇、渭、雍水地區，遺址的分佈極爲稠密；若干濱河地帶，遺址之密不亞於現在村落

的分佈密度，足見聚落之多與人口之衆（見附圖1）。遺址大小雖不等，小的也有三萬平方公尺，大的則幾乎有一百萬平方公尺，不遜於現代村落的大小（註二）。

這些遺址中的半坡遺址，曾經過考古學很具規模的發掘，其中發現頗可說明關中地區仰韶文化的面貌。半坡距西安約六公里，在澧河東岸的階地上。1954—57年間，共經過五次發掘，聚落遺址佔地五萬平方公尺左右，而中心三萬平方公尺的地帶有極密集的建築物，居住區以外有大溝圍繞，溝外爲墓葬遺址，溝東則有陶窖遺跡。（註三）

半坡的房屋，復原後可有方圓二式的，半地下居室的，有草泥作頂，簀支柱覆蓋土穴，地上有灶，屋內有隔室。另有一種地面木架建築，也有圓有方，屋頂覆蓋茅草或塗草泥土。室內地面都平整光滑，甚至經過純淨的黃色草泥土鋪墊（註四）。房屋分佈方向一致，且成組存在，可能是一羣小屋向着中心大屋開門，成組的現象似也有了比家庭更大單位的聚落現象。（註五）。

半坡居民以農業生產爲主要的謀生方式，而輔以飼養家畜，但是採集野生植物及捕食水陸動物，仍佔一定比重的食物來源。食物以粟爲主體，頗有幾處窖穴中發現粟米的儲存，又可看出生產已到稍可積聚的地步。白菜或芥菜等則是食用的蔬菜。工具有石斧石鐮以伐木，石鋤石鏟以掘土，石刀作爲收割的工具；木製工具自然也可能存在，只是朽爛不可考；獸骨及廢陶片也是工具的材料。耕種方式則可能是燒荒式的刀耕火種（註六）。

半坡的村落可能有四百人到八百人聚居，這種村落在澧河流域有二十餘個，很可能就構成一個以澧河爲範圍的集團（註七）。

據估計，半坡的時代在3000—2500 B.C.（註八）；也就是說，在西周滅商前十五到二十個世紀，這一段漫長的歲月中，有許多事可以發生。因此，我們至多只能說這是周人祖先繼承的或進入的文化遺產，却不能說這就是周人直接發生關係的文化。

壓在仰韶文化之上而又直接壓在西周文化遺存之下的，是客省莊第二期文化，因此客省莊第二期文化應該代表西周以前的關中文化面貌。1955—57年，考古工作者在灃西一帶的工作，也供給了我們對於這一段歷史許多實地的資料。

客省莊第二期文化事實上是渭河流域的龍山文化，具有地方性，然而也與豫西晉

南的龍山文化有密切的關係，同時與甘肅臨夏的齊家文化也有相似處（註九）。

客省莊第二期文化在渭河流域堆積甚厚，大約一直持續到西周文化出現的時候，事實上，在灋河流域許多次調查中，客省莊第二期文化與西周文化之間，沒有出現過另外的文化遺存，二者在年代上極可能是啣接的。客省莊第二期文化的晚期部份，可能與河南三里橋的龍山文化同時，也接近甘肅臨夏大何莊的文化，而後者已有金屬器物出土，據考古學家的意見，客省莊第二期的遺物中也顯示了模仿金屬器物的現象，陶器上常有鉤釘形裝飾，陶器器沿有的薄而微折，因此，灋西報告的撰作者認為：這時在其隣近地區已經出現了金屬業，至少也已與有了金屬業的地區發生接觸（註十）。

在中原豫西晉南的龍山文化，可能即與鄭州早期殷商文化之間有承襲關係，而鄭州的青銅文化雖然粗糙，却有人認為可能是安陽出土青銅器的不祧之祖（註一一），由此推論，客省莊第二期文化的下限，可能延長到中原已有青銅文化的時候。換句話說，客省莊第二期關中居民的晚近一羣，可能與殷商青銅文化在鄭州的居民聲氣相通了。這時候，假如正是西周祖先太王遷入渭河流域的時代，這些移民看見的文化景觀，可能正是客省莊第二期文化遺存所表示的面貌，假如晚期的客省莊第二期文化還晚於太王的時代，那麼在客省莊村北出土的文化遺存簡直就是西周祖先的手澤了。因為西周文化的起端並未必即相當於西周朝代的起端，我們無法從上面兩個可能性中決定孰為更大的可能，但是客省莊第二期文化無疑與西周祖先的生活環境有極大關係；簡單的描述這個文化，無疑是值得的。

客省莊村北的遺址，代表客省莊第二期文化的晚出部份，這一批十座房屋，基址都是半地下式的土窖，上面可能是木架草頂，可是地面跡象都已無存，房屋一般為內外兩室合成呂字，內室或圓或方，外室則都是長方形的。內室有灶，外室有「壁爐」。地面平整，但沒有白灰面。出口處有斜坡的通道。這種房屋的結構，上與半坡的遺存相似，下與鄭州的商代房屋及張家坡的西周房屋接近，顯然持續了極長的時間（註一二）。

客省莊第二期文化的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而主要的農具當是出土數量甚多的石刀，內凹的刀口大約用於割穗，家畜有狗、豬、羊和黃牛、水牛。石製與骨製的箭鏃及骨製魚鈎、說明了捕食野物仍是食物來源之一，成堆的田螺殼大約是採集作食用的

殘餘，陶祖表示生產力信仰及可能具有的後嗣觀念，羊肩胛骨不經鑽治，即用爲占卜的卜骨，這個骨卜的習慣是上達龍山，下至殷商，頗爲古老的信仰生活(註一三)。

張家坡在客省莊西南約一公里半，西周的遺址出土甚豐，其中早期的可能在文王作邑於豐的時代(註一四)。因此，我們可以借張家坡的文化遺存來觀察西周文化的面貌。

張家坡的房屋遺存，在早期的也有半地下式的長方形淺土窖，有柱穴，表示原來有木架建構作屋頂，較淺穴稍晚的是深土窖式的房屋，大致的構造是在一個豎穴內向一壁掏挖，造成窖洞狀的居室，晚期的房屋中爲圓形半土窖式，室內地面平坦堅硬，附近有夯土，似乎建築中也有以夯土作牆壁的。居住遺址附近有井，顯示當時除利用河川的水源外，已在自覓水源(註一五)。

張家坡遺址有手工業的遺跡和遺物，包括鑄銅的殘餘、鑄模和外范；骨器成品、半成品和廢品；殘餘的陶窖和壓錘。有的工場與居住遺跡比鄰，說明了這個遺址與手工業工人的關係(註一六)。

砍伐、切削和敲砸的工具以石器爲多，如斧、鐮鑿之屬。可是也有一件銅斧，是鑄成的：十五件銅刀，也有鑄紋。農具包括挖土的鏟和收割用的刀與鎌，數量很多，石製、骨製及蚌製都有，刀用於割穗，鏟則用於割莖，並有石臼石磨作爲輔助工具，有關紡織的工具有紡輪及銅製骨製的錐；武器有銅鏃(註一七)。

玉石製、骨製與蚌製的飾物，種類繁多，頗有雕琢紋飾，並有松綠石鑲嵌，也有琢成鳥形魚形的。有一件骨雕馬頭，手法簡樸而象形特徵很明顯(註一八)。

張家坡早期與晚期的堆積中，都發現有帶釉陶片；陶胎作青灰色，質細，釉爲青色或黃綠色，有帶細方格印紋的紋飾。近年來帶釉陶器在屯溪丹徒的西周墓中大量出現。經過檢驗，專家們認爲張家坡帶釉陶與南方釉陶有極大關係，甚至可能是在南方燒造了，流傳關中的(註一九)。

由於張家坡遺址，一般言之，比較簡陋，但也有很精緻的手工飾件。豐西發掘報告的撰寫人遂認爲居住遺址中有一部份是手工業者的住家與工場。張家坡未必是豐鎬本身，但豐鎬的原址可能即在灋水附近，因爲這一帶是遺址最密集的地區(註二〇)。

張家坡墓葬可分五期，第一期可能相當於成康之世，第五期可能在西周王朝的末

年或更晚，墓葬形式與殷墓相似，如腰坑、如俯身葬、如各種與安陽玉石相近的魚、鳥、蟬、蠶等玉製殉品、如用人殉葬、如車馬坑……（註一〇）。但凡此只說明了西周王朝文化與殷商文化間的血緣，在時間條件上說，這些遺存已越出了本文範圍。

總結半坡，客省莊第二期及張家坡的考古資料，關中涇渭流域，由仰韶文化以至西周文化，二三千年來有其持續性：如密集在河濱的聚落，以農業為主體的經濟生活，半地下室的居住方式，……都說明了這個地區本身具有的發展過程。關中地區的文化與鄰近其他地方文化早有接觸，而與晉南豫西地區的關係，似乎與青銅的在本區出現相伴發生，最長久也最密切，而西周文化中有了殷商文化的特質，同時，也就在西周的時代，關中有了與南方江、淮流域接觸的跡象。

二、周人的祖先

周人的祖先，根據傳統的文獻資料，是一位半神半人的后稷，主要的史料是詩經的大雅生民和魯頌閟宮，把兩段資料合在一起，我們可以很清楚的認識這個民族起源故事的神話性。后稷自己就是一位女郎——姜嫄——踐踏了巨大脚印而感生的聖胎。在他幼年的時候，后稷也歷經試探，逃過了牛羊的踐踏，逃過了森林林中的迷途，甚至在冰上也凍不死，有飛鳥來庇護他。磨煉只是證實了后稷的天命。等后稷長大了，他顯然變成一個極成功的農夫，懂得種豆種麥，他的莊稼一切豐碩。后稷兩字，譯成白話，即是『稷之神』或『稷之君王』，尊號變成了私名，也可以說明這位人物歷史性的不足徵考（註一一）。后稷的子孫，據史記的世系傳到文王共經過十五君（註一二）：

后稷——不窋——鞠——公劉——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公叔類祖——古公亶父——王季——文王

但是這個世系事實上很有問題，國語只說到后稷不窋是「先世」「先王」，中間別無世代的說明。高圉太于也似是一人（註一三）。公劉至古公亶父間的世系，史記的根據是世本，由后稷到文王只有十五世。按傳統古史系統中誤將后稷列於虞廷，與舜禹同時（註一四），則依其年數計算，每代的時間都太長，早就招致史家的疑問（註一五），因此，我們還不如採用詩經的辦法，把太王直截只說成是『后稷之孫』——后稷的後

裔；把公劉與太王之間的世代也懸爲待決之案。反正后稷只是一位由神降生的始祖，公劉也只是太王的前代，其間代數不必推敲（註二七）。

公劉的事跡，於史較多記載，主要的來源是詩經大雅公劉和孟子梁惠王下篇，甚至史記的記載也不過由此望文生義（註二八）。從詩經本文，公劉是一個殖民領袖，率領了武裝的族人，憑藉農業的積儲開拓了新的疆土，再在新的土地開闢田畝，作更多的儲積，準備作進一步的武裝開拓。據說后稷居邰，到不窋之世逃到了戎狄之間，公劉到達了邠的地方。邰、邠的所在地，下文再論，我們要注意的是在公劉傳說中，可以看到這個殖民活動是在有山有岡，有泉有河的地方，也可以看到部族的軍事組織及對於農業的依賴，而且有了芮和密兩個附屬於周的國家。

亶父即是後世所稱太王，是周文王的祖父，到太王之世，周的世系方是完全可考，而周的疆域也確實可在陝西的涇、渭流域，各家幾乎在大方位上都並無異說（註二九）。

有關太王事跡的史料，主要是詩經大雅緜和孟子梁惠王下篇，由這兩大段記載，我們可以看到太王遷徙的辛苦，締造的艱難，建國的規模，和周與鄰族的關係。姑且把岐山的位置留在下文討論，我們至少知道太王受了狄人的逼迫，率領了族人和百姓，踰越岐山，在渭水流域建立了新的城邑（註三〇），而逼迫太王遷徙的敵人，一般都認爲即是殷末著名的鬼方（註三一）。

太王建立都邑的記載，在詩經中寫得有聲有色，他帶着妻子，遷徙到岐山之下，渭水河谷的平原，土地肥沃得連苦菜都帶甜味。經過了適當的占卜，卜龜認爲可。這是好地方，於是太王就在渭水邊上住了下來。自來解經，總把緜的『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說成太王未遷居前居住在地穴中，可是我們寧可把半地穴式的居屋作爲關中地區普遍的居住方式，同時把這八個字解爲太王遷來，這一地帶未建都邑前的一般風光。也許，太王挑選了一個適當的地方建設都城，而這裡可能本來就有一個以半地穴爲主的聚落，於是詩人詠詩及之。我們不能以此解釋太王的故事爲周人初知居住地上的宮室，更妥當的看法：太王之世，平民居住半地下室或地下室，仍無妨有貴族居住在茅茨土階的地上宮室（註三二）。

從詩經這一段建設都邑的描述，後人不難在想像中重這一段史事的圖象。在河谷

的平原上，田畝之間開了一道一道的阡陌；同時在一片選定的土地上，管理工程的官員和指揮工役的官員受命於太王，忙碌的分配工作。直線劃定了牆基；夯土的木版一段一段接過去，打夯的哼唷，削木砍材的噉噉響聲……宮殿建成了，寢廟造成了，城牆造成了。在鼓聲中，立門開戶的儀式進行著，最後，社壇也已經築好。好一幅新建都邑的圖畫！只是，由於亙幾千年在這一條河谷已密集地建立了許多聚落，我們還是寧可假定這一番建築僅是在舊有聚落上加上新的宮室城廓，卻不是在一片荒地上平地起樓臺（註三三）。

由后稷到太王的事跡，史家大抵根據同樣的資料撰述，其間未有大差別。可是傳說中后稷的居地邰在哪裡？公劉邑居的邠在那裡？太王跨越的岐山在哪裡？這些地方是周人祖先活動的舞臺，史家考證地望，却各有所指。由於不同的假設會導致對先周歷史不同的瞭解，我們不能不在若干假設中有其抉擇。但是，我們無妨對小小的差異放在一邊，在本文只討論兩個根本不同的假設；一派是周人祖先在陝西西部活動的假設；一派是周人祖先在山西活動的假設。

以爲周人祖先居地在陝西西部逐漸沿涇水渭水東移的說法，在中國史書上有了極久的傳承，甚至陝西有許多地名也還似乎很合乎古史，例如姜嫄。這種說法顯然深入人心，不僅當地的居民視爲典故，史書記載及實地調查也以此爲據。例如石璋如先生即把邰放在雍水入渭的三角地帶，相當今日武功縣附近，邠放在三水河與涇水匯合的附近，在三水與邠縣之間，梁山放在乾縣，岐山放在武功西北，於是周人祖先活動的範圍爲涇渭之間的河谷，威脅太王，逼使周人遷徙的狄人，則居住在涇水上游的慶陽（註三四）。

第二種假設却把周人活動的地區放在今天山西省的汾水流域。錢穆持此說最力，他以爲地名會跟着遷徙的人民移到別處，是以僅據今日相傳的地名作考證，並不見得可靠，錢氏在古書中梳爬剔選，務求調和左傳、孟子與史記中古史事跡發生地點的不同解釋，終於考訂爲周人原先在山西省內活動。簡單的說，邰當在山西聞喜縣，邠地當臨汾水，以水改邑，成爲邠字，太王受汾水上游戎狄的逼迫，才率衆渡河西遷陝西西部富平一帶。周初地名的西移錢氏以爲是由於周君封邑原在陝西西部的鳳翔帶，以致這一個地區保存了許多古地名（註三五）。

第一說與第二說，空間距離太遠，任何調停之說都難兩圓，爲作一選擇，我們必須借助於姜族地望的認定。在周人祖先傳說中姜人是經常出現的與國友族，后稷的母親是姜嫄，太王的配偶是姜女，後來，文王東征的主將是姜的太公望，因此姜與周有顯著的歷史關係。找到了姜的活動地區，周人也總在其附近。

姜與羌的關係。傅孟真先生曾在姜原一文中從文字學上提出證據，其說可謂已成定論。(註三六)。然而有人以爲羌的居地即在漢世羌人活動的蘭州西寧諸地，也有人以爲周以前的羌，即使不遠在西陲，仍應該在陝西西部武功更往西的地區(註三七)。錢穆以爲姜氏先祖的故事如神農、許由以及四岳，都似乎應該在山西省內尋找；然而證引恍惚，不能確認(註三八)。傅氏則歷考姜姓諸國遷徙痕跡，斷定姜姓與四嶽的關係：四嶽實是四座大山而四嶽諸國是山中部落，姜姓大國的甫與申，便由嶽神降生。至於姜之本原，傅氏考定在豫西渭南許謝迤西的山區中，也就是國語鄭語所謂『謝西之九州』；其在山東的諸姜，則是周東封之後建立的(註三九)。按之後漢書西羌傳，范曄顯然把陸渾、陰戎、蠻氏、驪戎、義渠都當作羌人看待，而以爲漢代羌人偏在西服是遷徙的後果。上述諸戎，除義渠偏在陝西西北部，其餘諸族都分布在渭南以至伊洛之間(註四〇)。如果范曄在羌與春秋諸戎間拉上的關係，不是無的放矢，這些戎族的居地，即與傅氏指出的姜原甚爲吻合。

更有一項證據，董彥堂先生據甲骨卜辭的資料，指出殷商王國與羌人之間頻有戰爭，時有婚媾，也常見和平的賓會交往，羌人有作爲祭祀犧牲，也有作爲奴僕的(註四一)。若羌人偏在西部，由安陽四周的黃河平原遠征陝北隴右，中間須經過周人居地；殷羌之間的關係的記載，似乎不該比較殷周交往紀錄更多(註四二)。比較合理的假定、是羌人故地離涇域也不遠，若姜（或羌）原如傅氏假設，在豫西山地，則各方面都說得通。本文第一節曾指明涇渭流域的考古資料、每顯示與豫西晉南的地方文化有其顯著的親緣，如果姜原在豫西山地，姬原在汾水流域的假定，也就可以順理成章。固然這種論證仍嫌間接推論，然而也還合理，於是我們無妨假定周人祖先在汾域發跡，公劉建國也在晉地，直到太王之世，周人才徙居渭域並在渭域建都立邑，但是周人的老伙伴諸姜，始終與周爲鄰，只是相對位置先爲南鄰，後在東南而已。

三 周 人 的 擴 張

逼迫太王由邠遷岐的狄人，舊說以爲昆夷，或以爲獯鬻，徐中舒氏根據王國維氏的考證，認爲卽是鬼方，但並不同意王氏以三名同爲秦漢時匈奴的說法。徐氏以狄人的隗姓就是鬼方的姓，而狄以山西境內部族部落最多。鬼方可能在武丁之世不堪殷人壓迫，轉而西侵，邠地的周人首當其衝，不能不折而南避，到王季之世，在渭水流域已能够建國穩固，於是反而能够把昆夷串夷降服收撫。徐氏此說，能把易經中高宗伐鬼方的事，太王避狄事與王季撫昆夷事，都配合解釋，並與前節周人起於山西的假設相合，誠可說發上古史未發之覆（註四三）

根據縣詩，混夷從命之後，虞芮也變成了周的屬國，虞芮都在今日的山西省。本文前節已說過公劉曾伸張勢力於芮、密，是以王季的經營也不過在光復舊地，從太王新徙的涇渭流域，再度伸張勢力於汾水流域，史記殷本紀記載武乙獵於河渭之間，被暴雷震死。雷劈觸電是異常變故，不能說必定沒有，但究屬非常。錢穆以爲很可能是武乙耀兵河渭示威周人，反被周人所殺，正如昭王南征不復，而楚人諉諸水濱一般（註四四）。此說若然，則周人在山西的發展實際已經循河拊殷王國之背，不須文王之時，周人勢力已惹起殷人注意了。卜辭中有不少『寇周』的句子，也有『令周侯』的記載，當卽是周人在名義上仍爲殷屬，在國力上仍比殷弱，然而殷人不能不時時侵軼，以圖禁止其發展（註四五）。

周人的力量不僅在北路向東方伸展，在南路也有相當的行動。與此處有牽涉的史事，主要見於論語和左傳的太伯讓國傳說，到史記時，吳太伯的故事已極具細節。據吳太伯世家和周本紀的記載，太王有太伯、仲雍和季歷三個兒子，據說是爲了季歷的兒子昌——後來的文王——『有聖瑞』，太王有意讓季歷卽位，以便未來由文王繼統，於是太伯、仲雍逃避『荆蠻』，斷髮文身，以全父志。武王克商以後，封仲雍之後周章於吳，另立周章之後於夏虛，號爲虞仲。而吳與虞字，在古可能卽爲同一字（註四六）

吳在春秋時，甚晚始入中國，是以中原每以蠻夷處之。吳自稱姬姓，也有人以爲是冒充。徐中舒氏根據左傳記載，認爲吳公室姬姓，應是事實，但是徐氏致疑於太伯仲雍以個人身份逃亡的傳說，認爲吳離岐山太遠，幾個單身的亡命客難以在遙遠地區

立國傳世。因此徐氏提出兩個可能性；第一，太伯仲雍率領周人遠征之師經營南土，於是遠戍不歸；第二，太伯仲雍也許不見容於周轉而接受殷商卵翼以立國於吳（註四七）。傅孟真先生力主後說，以爲尚書牧誓指責紂爲『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及左傳昭公七年『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即是坐實罪名。徐氏則主第一種假設，以爲周人對於王季兄弟的友于之德，從無間言，而商人卵翼之國亦不應離周如此之遠。於是徐氏假定周人力量不足，在羽翼未豐以前，不能與商爭中原，只有向江、漢開拓，而可能又因楚地的抵抗力強，折而更向東南。（註四八）

本文第一節，曾說過張家坡西周遺址出土的帶釉硬陶，據專家分析，與南方帶釉陶及越甌青瓷有關係，甚至有人以爲這種帶釉硬陶爲東南輸入的外來貨。渭水流域與東南的交通，似乎不算稀少，同時東南考古所得，也顯示了與西周早期的關係。在長江流域，所謂『湖熟文化』遺物中，曾昭燏與尹煥章兩氏發現了陶器，器物形制與花紋，不少殷商與西周早期的影響，石器與殷周銅器也有同處（註四九）。西周早期銅器，也成羣的出土於丹徒和宜城，器物形制都有西周早期特徵，而不同於殷（註五〇）。曾、尹二氏以爲凡此跡象，不僅說明長江下游在西周時代已有北方文化，而且那些與北方銅器極度相像的銅器、可能即由北方輸入。丹徒烟墩山出土的銅器有西周銘文，更說明此點（註五一）。

張光直氏又指出，這些意義重大的西周銅器，從考古紀錄看來是土著繩紋陶遍佈地區的幾個孤立文化島嶼，很可能是少數西周殖民者在統治當地的土著。張氏並且特別提起太伯仲雍的傳統來解釋這個現象。（註五二）。

張氏根據湖熟文化遺物所作的推論，加上張家坡帶釉硬陶的出現，實在已爲徐中舒「吳爲西周殖民」的假設提供考古學上的佐證，我們在前文第二節也引證傅孟真先生關於姜姓居地的假設。如果姬周的友族諸姜分佈在渭南豫西，由此假道的西周殖民隊伍、極自然的可以取道漢水直達荆楚。若在荆楚遭遇的阻力太多，再折向長江下游，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殷商的根據地在黃淮平原，當殷商勢力仍大時，今天的湖北省境大部份可能籠罩在殷王國直接干預的地區，西周殖民隊伍也許比較難以立足，不能不走得遠些。

總結本節，太王王季兩世經營，不僅在關中的涇、渭流域建立了國家，而且光復

舊城，把山西汾水流域的故地重新收入勢力範圍，諸戎的聽命，使西周在今日山西陝西的山地建立了威權，循黃河北岸東達殷商所在的北平原已無大障礙；另一面，西周結好諸姜，使渭南至於伊洛之間也歸入西周勢力範圍，南出一枝殖民隊伍，却未能成功的在江漢活動，不得不遠徙江南另立國家，在滅商的過程中也不能發揮具體作用。

四、文王時代的活動

王季時代經歷了兩世的慘淡經營，周人的勢力已頗不可輕視，照後世稱頌的詩篇來說，他已經『受祿無喪，奄有四方』（註五三）。奄有四方的語句，略涉誇大，至少當時還有強大的殷商在東方的平原上，文化高、國土大，不是周人可以比擬的。但是周人與殷商之間，大體上還維持友好的關係，王季自己的配偶就是由殷商來的，這位下嫁的『太任』，也就是文王的母親。（註五四）。可是最後王季是死在殷商君主文丁的手裡（註五五）。於是這個開國的任務，就留給文王來完成了。

據史記周本紀：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之（註五六）。可是文王自己還要親自下田耕種，（註五七）。以三世領主，奄有不小的疆域，文王可以不必自己下田，也許這種舉動，與後世籍田相似，只是一種象徵，象徵他『遵后稷公劉之業』？

周的鄰邦是犬戎、密須、耆、邶、邶崇，先後都被文王征服，文王把國都遷徙到豐水之西，立邑曰豐，這一番征戰是重要的，也是辛苦的。從此以後，周人東討的正面已無阻力而左右亦無後顧之憂，國都遷豐邑，正是文王東方是謀的開始（註五八）。

另一方面在山西的虞和芮，已經明顯的服屬於周，所謂『虞芮質厥成，文王蹶蹶生』，似乎虞和芮都送質於周，以求和平相處（註五九）自此之後，周人在河東的力量也更形穩固了。有此外圍，周人遂自詡有了許多爪牙黨羽，所謂『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得意之態溢乎言表。（註六〇）

文王遷都于豐，大約也頗有經營，高築城牆，臨于水濱，而且說這是禹的故土，（註六一）。從傅孟真先生的理論，這裡以大禹為招牌，大約也是文王時開始的策略。周人自許為夏代的繼承人，夏代的復仇者。傅孟真先生指出周人自比於夏乃是政治口號，正如劉淵自稱漢裔，建州自稱後金（註六二）其說甚確。周人確曾自稱為夏人，如尚書

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又如詩經周頌用『時夏』自稱^(註六三)。周之採用夏后故號，當是企圖與晉南夏虞諸侯拉攏，而且爲伐殷找一個藉口。殷、周爲異民族，周人以夷戎稱殷，自比爲華夏正統，也許即自文王始^(註六四)。

周人可能曾經作殷的屬邦，即使其間關係未必一直很和諧，至少周人承認殷商是「大邑」，自己是『小國』^(註六五)。沒有這一番宣傳周很不容易與殷商翻臉。配合上夏殷對立的宣傳，周人又自己宣稱得到上帝特別的眷顧，周的天命是上帝棄商而畀於西方新國的。詩經大雅皇矣：『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註六六)。傅孟真先生指出，古代之上帝原爲部落神，周人竟由商借去，^(註六七)。其最初目的可能也是爲政治口號，然而一借之後，中國的上帝由部落的神轉變爲道德的神，不可不說是思想史上一件大事。自茲以還，周人指斥殷商酗酒、接納逋逃……種種惡跡，都爲了坐實「上帝棄汝」的口號，可是也爲中國道德觀政治立下第一次定義^(註六八)。

綜述本節文王時代，在武功方面清除了鄰近諸侯，使東征時前無阻隔，後無顧慮，在意識方面，也可能是文王時，開始把周自比爲夏後，以建立與殷商對敵的身份而可能也是文王時，周人自許爲道德與天命的維護者，作爲討伐殷商大國的藉口。

五 周人滅商

文王死後，武王繼續完成了周人數代以來的工作，把周室的政令推行到東方的平原上，據史籍的記載，武王奉了文王的神主，帶着軍隊到了今天河南孟縣的盟津，各處諸侯『不期而會』的有八百多位，可是周人終於沒有進一步開戰，却又退了回去。^(註六九)

不久，在公元前1122年，武王再度統帥西土的各邦軍隊，加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族的聯軍，據說總兵力是三百乘戰車，勇猛的武士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到達離殷都安陽不遠的牧野（今河南淇縣南）。在戰場上，武王手執武器，揮舞着旗幟誓師，數說商王紂的罪名：聽信婦人的話，怠慢了神靈，疏遠了弟兄，庇藏四方的逃犯。武王自命爲恭行天罰：這就是後世所謂吊民伐罪的戰役。軍隊

在他的激勵之下，與商王的大軍接觸了。商王七十萬大軍，經不起勇猛的西軍衝突，而且前鋒的軍隊突然倒戈相向。殷商大敗，據說死傷之多，『血流漂杵』，惹起好問的人懷疑『仁義之師』的真實性。(註七〇)

牧野之戰中，參加武王軍隊的成員，顯然有友邦領袖自率的友軍，及直屬周人的軍隊(註七一)，大約累世與周和好的姜族，出了很大的氣力，牧野勇將『鷹揚』的尚父，即是姜姓的領袖。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族，自漢、唐以來，史家都以爲是來自中國西南部四川、雲南各地的蠻夷。但近人考證，頗有使人信服的理由，指出這八族可能是漢中以至洛水的若干部族。(註七二)

在殷人方面，軍隊中可能有不少是東方的夷人，也就是太皞少皞之族。據說他們『離心離德』，可能由此才有了『前徒倒戈』的事。殷人末代國君紂(或帝辛)原不是一位膏粱的人物，由史籍資料看來，帝辛之時國勢頗強，只是紂好大喜功，把國力消耗於與東夷的戰爭，一面西防周人，一面東伐東夷。兩面作戰，疲於奔命，而軍隊中的夷人又臨陣倒戈相向。卜辭中征人方一事，也證實了紂在東方曾大有舉動，也許人方即是左傳的東夷。『紂克東夷，而隕其身』，大約可以解釋殷滅亡的原因，也正可說明周人在牧野一役能以少勝衆的緣由了。(註七三)

殷王紂戰敗自焚，周武王開始着手穩定對東方的控制。周的首都仍在豐水上的鎬京。周封建紂的兒子祿父(即武庚)統治殷商舊域，由管叔鮮與蔡叔度在旁監督，號爲『三監』。(註七四)武王不久去世，周公執政，三監聯絡徐、奄、淮夷叛周。(註七五)經過征夫辛勞，暴露三年的東征，周公第二次征服了東土。從此周人不再侷促於渭水流域的故土。周公在今天的洛陽建設了一個東都成周，(註七六)在成周不僅有王室的軍隊，而且有投降的殷商舊軍『殷八師』和殷王國政府中的大小官員『胥伯小大多正』，(註七七)這些殷人的舊貴，似乎仍保有他們自己的姓氏宗族組織和生活習慣，連墓葬的許多細節仍從殷俗。(註七八)周王室的姻黨宗族也紛紛封建立國，作爲周室屏藩，這些分封的諸侯，也都分到一些俘虜的殷人，他們之中不僅有一般的百姓，顯然也有成族成族的舊貴族，以其專門的知識侍候新的主人。(註七九)

作周室屏藩的諸侯，在分布上也不是隨意的。據傅孟真先生的研究，有好幾個重要的藩屬，如齊、魯、燕，原本都建立于成周洛陽的南方，以輔翼成周，控御南方及

東方。(註八〇)這些封國犬牙相錯，在成周前哨列成一串拱衛線，而諸國能在殷商舊宅的邊緣立足，可能也賴諸姜的豫西舊勢力為後援。一直等到第二次東征直薄海嶠，周人才把幾個最重要的藩屬，也就是尚父的齊，周公後人的魯，和召公後人的燕，移到東方與東北，進一步鎮守在東方平原上。(註八一)到這個時候，中國核心區域已統一於同一政治體系，周室的封建網已經籠罩了主要的戰略據點，周人成功地號令了中國。

※ ※ ※ ※ ※ ※

本文嘗試把考古資料，文獻史料與近人的考證溶合在一起，以敘述周人滅商的史實，在敘述的過程中，至少我們可以看到：第一、周人的文化基礎也很古老，其程度與黃河下游的殷商文化相差不多，而且二者間有密切的關係；第二，周人經過好幾代的經營，逐步向東方進迫，過程是漫長的，其中必有相當密切的文化接觸，此點足以進一步支持殷周文化雷同的必然；第三，東方的夷人似乎未必與殷人合作來對抗西方的周人；反之，周人可能利用東夷造成對殷商包圍的形勢；第四、傳統歷史系統有其可信處，例如吳為姬周殖民，現在已獲得考古資料堅強的佐證。正是為了這個理由，本文也曾依賴傳統性的史料，敘述無法利用考古資料的一些細節。本文草就時，適本所為李方桂先生慶壽，謹借此篇幅，為長者壽。

附識：1.本文係中國上古史稿第三本第一章。審查人為石璋如高去尋兩位先生。

2.本文版權屬中國上古史編輯委員會所有。

(註一) 石璋如，周都遺址與彩陶遺存（大陸雜誌特刊，第一輯，1952）p. 359ff. 同氏，傳說中周都的實地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下冊，1948）同氏，關中考古調查報告（同上，第二十七本1956）pp. 236ff; 272ff; 313ff. 最後一篇為詳細的調查報告註。

(註二) 西安半坡（考古學專刊〔北京，文物出版社〕，丁種第十四號，1963）p. 2-5.

(註三) 同上，p. 7-9.

(註四) 同上，p. 9-35.

(註五) 同上，p. 41-42.

(註六) 同上，p. 222-226.

(註七) 同上，p. 227-228.

(註八) 同上，p. 231.

(註九) 濰西發掘報告（考古學專刊〔北京，文物出版社〕，丁種第十二號，1962）p. 5-7,8-9.

(註十) 同上，P9. 高去尋先生以為「直接壓在另一層文化層上的文化，與下層之間並未必是直接啣接的，並舉後崗第二期文化與小屯文化的關係為證」。本文作者甚感謝高先生的提示，但據發掘工作者的意見，濰水流域許多次的調查未見客省莊二期與西周文化間有其他文化其情形與後崗附近有其他層位關係者不同，則原文所說之可能性甚大。

石璋如先生以爲『客省莊第二期文化的分布，在關中地區相當的廣泛，遺址所在，大都沿着河邊，在高原上的很少。在地層上有壓在彩陶文化層之上的，有被壓在「西周文化層之下的」，這裡所說的西周文化層，在陶器方面說是指：鬲、豆、孟……等，它們的形制與殷代的銅器大同小異，認爲是周代的陶器，當無問題，但「所謂渭水流域的龍山文化」與周人有沒有直接關係？文王未遷豐之前究竟是怎樣的變化系統，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事，周人統治關中自文王至幽王二百餘年，也可以說根深蒂固，但就地面調查的感覺，彩陶遺址與「龍山」遺址之多不下於「西周遺址」，並且有不相疊壓同至地面，好像有並存的情形，這是值得研究的，究竟「渭水流域的龍山」爲陝西土著呢？與羌人有關呢？與周人有關呢？本文作者甚感謝石先生的提示，但列舉各項問題尙非今日資料所能答覆。

- (註一一) Kwang-chih Chang,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141-142 安志敏，黃河三門峽水庫考古調查報告（考古通訊〔北京，科學出版社〕，第十一期，19566）p. 6。按高去尋先生以爲「根據考古學上的發現在豫西一帶，河南龍山文化與鄭州的商代中期文化之間還有一個所謂洛達廟類型文化。最近偃師二里頭的發掘發現前後連續發展的三層堆積早期堆積當屬於河南龍山文化晚期。中期保留若干龍山文化因素，但基本上接近商文化晚期與洛達廟出土的接近可以說是一種商文化。在晚期堆積中發現排有礎石的夯土基址，並有小銅刀、銅錐。目下大陸上考古家認爲二里頭可能是成湯所居的西亳」。本文作者謹向高先生致謝這一段補充，石璋如先生以爲「鄭州白家莊出土的一批青銅器，形式簡陋，紋飾粗糙，大陸考古學家認爲是殷代中期的青銅器，比安陽出土的青銅器爲早，但在安陽小屯丙組出土的青銅器與之頗爲相似，就安陽來說丙組的墓葬係較晚的，因此就有二種說法：一種主張鄭州出土的青銅器比安陽爲早，除大陸的考古家主此說外，一般的日本青年考古家及美國的考古家多從之。另一種覺得它並不早，公認爲世界研究銅器權威的李濟博士，瑞典的高本漢教授，日本的梅原末治等均主之」。本文作者甚感謝石先生之提示。

(註一二) 參看本文前節，及澧西發掘報告，p. 7, 48ff.

(註一三) 澧西發掘報告，p. 8, 9, 50ff.

(註一四) 同上，p. 74。石璋如先生以爲『張家坡，客省莊甚至落水坡，鎮京觀等一帶，均爲渭水南岸的舊河岸，客省莊則爲豐水入渭的交插點，不過現在的交插點則北移很多很多。因爲是舊日兩水相交點，故先民的遺存堆積豐富，遺址的規模相當的龐大，而且「仰韶」「龍山」等遺存分布的相當的稠密，可以說明在文王未至豐以前此地已經是人口相當稠密的部落了，文王係在這種根基上出發而經營豐都的」本文作者甚感謝石先生之提示。

(註一五) 同上，p. 75-78.

(註一六) 同上，p. 78, 79, 78.

(註一七) 同上，p. 81-92.

(註一八) 同上，p. 106-111.

(註一九) 同上，p. 105, 162ff., 165.

(註二〇) 同上，p. 13. 關於豐鎬原址，根據文獻及金文的資料，黃盛璋以爲鎬在澧水北岸，不在澧水南岸，確切地點則不易定，參看周都手鎬與金文中的莽京（歷史研究，第三卷第十期，1956）p. 63-81.

(註二一) 澧西發掘報告，p. 14-15, 113ff.

(註二二) 詩經（十三經注疏本，藝文版）大雅生民：『厥爲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拆不副，無

舊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載之荏荪，荏荪旸旸，不役穠穠。麻麥幪幪，瓜瓞嗒嗒。誕后稷之穠，有相之道。萌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褒，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邠家室。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藥維芻。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藥芻，是任是負。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苴以載，載播載烈。以興嗣歲。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XVIII之I/1-20；魯頌閟宮：『閟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源，其德不同。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稌稷苾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XX之II/1-2另參看：傅斯年姜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p. 130ff.；顧頡剛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文史雜誌第一卷，第三期，1941）p. 8；孫次舟周人開國考（歷史與考古，第二回，1937）p. 2-3。

（註二三）史記會注考證（藝文版），IV/1.

（註二四）國語（天聖明道本，崇文版），I/2，IV/7。高去尋先生以爲周人亦可能報一人以上，如商代即可報上甲至報丁共四人。如此，常注以高圉甄圉爲二人，恐未必非是。本文作者謹致謝。

（註二五）史記會注考證，IV/5-6.

（註二六）同上，IV/4；參看石璋如前引『周都』，p. 378.

（註二七）孫次舟，前引文，p. 4-5.

（註二八）詩經大雅公劉：『篤公劉，匪居匪康，迺積迺倉。迺裹迺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即順迺宜，而無永嘆。陟則在巖，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原。迺陟南岡，乃觀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篤公劉，既漚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緼。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邇其過澗。止旅乃密，芮鞬之卽。』XVII之III/4-15；孟子（藝文版），II之I/14.

（註二九）顧頡剛，前引文，p. 10；孫次舟，前引文，p. 7-9；錢穆，周初地理考（燕京學報，第十期1931）p. 1985.

（註三〇）詩經，XVI之II/12-24，XX之II/4；孟子，II之I/15，II之II/11-12.

（註三一）徐中舒，殷周之際史蹟之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1938）p. 140.

（註三二）詩經大雅緜：『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萑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宜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揀之甕甕，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鼙鼓弗勝。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駸矣，維其喙矣。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

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X VI之II/12-24. 參看本文前節及吳昊垂殷周民族鬥爭始末（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三期，1941）p.2. 爲比較計，可注意殷都安陽即同時有版築的地上宮室及半地下室出土，兩者都爲居住遺址，參看石璋如殷虛發掘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的貢獻（學術季刊，第二卷，第四期，1954）p.14-15.

（註三三）詩經，X VI之II/17-20. 參看石璋如前引『周都』，p.377.

（註三四）石璋如，前引『周都』，各處帶歷史地名的古跡紀錄，出處已由石氏在文中徵引，可以複按，此處不贅述。由石氏所引資料看來，這一個地區的地名，早在漢詩即已與古跡有關係。孫次舟也持傳統觀點，以郿爲武功，郿爲郿縣，岐在武功之西，而公劉關境臣服的密與芮且在甘肅的靈台及平涼；參看孫氏前引文，p.4-8.

（註三五）錢穆，前引文p.1958-1992；吳昊垂全探錢氏考證，看吳氏前引文，p.2

（註三六）傅斯年前引文。

（註三七）孫次舟，前引文，p.2-4，又參看董作賓漢白麟考（安陽發掘報告，第二輯1930）p.331-333.

（註三八）錢穆，前引文，p.1959-1963.

（註三九）傅斯年，前引文。

（註四〇）後漢書集解（藝文版），L X X X VI/1-4.

（註四一）董作賓前引文，p.331-332.

（註四二）孫次舟，前引文p.4,9.

（註四三）徐中舒，前引文，p.138-140.參看王國維鬼方昆夷獫狁考（觀堂集林，藝文版）X III/5-12. 武丁伐鬼方事，易爻辭曾兩次提及：即濟之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及未濟之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賞于大國。』（周易注疏〔藝文版〕VI/22,25）徐氏解釋『震』義爲周以小邦而勝，又獲賞大國——商，故有震驚之意。其說稍嫌穿鑿，但無妨於高宗伐鬼方之史實。據竹書紀年，王季曾伐西落鬼戎，俘虜了二十位翟王，伐燕京之戎，却大敗而回，及至王季克余無之戎，遂受命爲牧師（以上諸條均見後漢書集解西羌傳引，L X X X VII/2，當是真竹書紀年殘文）。王季所與交戰的諸戎，殆即詩經大雅皇矣『串夷載路』及縣『混夷攷矣』的串夷混夷？參看錢穆前引文，p.1995-2001.按高去尋先生以爲近人陳恭祿頗疑孟子避狄事之不可信。即使避狄事可信，徐中舒先生把它與高宗伐鬼方兩事聯結在一起解釋也有問題。因爲周文王與殷帝辛是同時人，由文王上推三世三王爲太王，由帝辛上推七世十王。爲武丁，兩人中間相距四世七王。即便舊說武丁享國很久，又文王也年壽很長。但武丁也很難斷成與太王同時。歷史上民族的波動有時是逐漸形成的但是如果鬼方與周人都原在山西，則武丁壓迫鬼方，鬼方遷徙或移動，便可立即壓迫到了周人，不令費時很久，所以太王的西遷是受武丁時代殷人勢力的擴張的直接影響的。」說法是可以再考慮的，作者向高先生致謝。但作者以爲武丁與太王並非不可能同時，例如Mattiras Tchamg “Synchronismes Chinois”（Vaities Sinologiques no. 24,1905）p.14即以古公亶父遷岐事置於武丁即位前四年。Tchamg氏所列固然未必爲是，但足見殷周相當年代之排列可以有將武丁及太王列爲同時之可能性。

（註四四）錢穆，前引文p.1994.

（註四五）卜辭諸條，見董作賓殷虛曆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1945）：癸未，令旂族寇周古王事。（前編IV/32）貞，令多子族畢犬侯寇周古王口。（同上，V/7,VI/30.）

𠄎令旃從畀侯寇周。(同上VII/31)。

𠄎令多俘犬侯𠄎周口王口(同上, VI/51.)

𠄎令周𠄎俘𠄎獲。(同上, VI/63.)

貞, 畀喜令從寇周。(後編下37)

申弗戎周十二月。(鐵26)

令周侯今月亡田。(新272)

(註四六) 史記, X X XI, IV/9. 太伯遺跡在今日江蘇無錫縣境內。『荊蠻』之說, 殆指太伯南來過程中的第一步。斷髮文身是吳越水居風俗與荆楚無關。然則太伯南南徙, 或者先到江漢, 再到吳會? 此事見於左傳者, 在閔公元年、僖公五年、哀公七年(左傳注疏[藝文版 XI/3, XII/22, LVIII/7]; 見於論語者在泰伯篇(論語注疏[藝文版], VII 1)。吳、虞古爲同字異書, 大約二國確有關係。

(註四七) 徐中舒, 前引文p.142-143.

(註四八) 同上 143. 按西清續鑑甲編(涵芬樓依寧壽宮寫本影印)云, 在乾隆二十有六年『臨江民掘地得古鐘十一』, 爲吳王皮難之子者滅所作(X VII/4.), 臨江今當江西清江縣, 也可能在安徽和縣。顧頡剛以爲吳國由江漢東徙, 可能先至江西, 參看顧氏前引文注19。

(註四九) 曾昭燁、尹煥章, 試論湖熟文化(考古學報, 1954年4期), p.54.

(註五〇) Chang Kwang-chih; op.cit., 253. 參看汪志敏韓益之, 介紹江蘇儀徵過去發現的幾件西周青銅器(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12期) p.31.

(註五一) 江蘇省文管會, 江蘇省丹徒縣烟墩出土古代青銅器(文物參考資料 1955 年10期) p.58-62、尹煥章, 南京博物院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文物, 1959年4期), p14' 銘文的年代問題頗有專文論及, 如郭沫若以爲係武王成王時器, 唐蘭以爲係康王時器, 而且是吳與西周關係的佐證。參看郭沫若夫殷銘考釋(考古學報, 1956年1期), p.7 唐蘭宜侯矢殷銘考釋(考古學報1956年2期79-83.

(註五二) Chang Kwan-chih, op.cit., p.253-255.

(註五三) 詩經 X VI之IV/6.

(註五四) 詩經大明:『摯仲氏任, 自彼殷商, 來嫁于周, 曰嬪于京, 乃及王季, 維德之行, 大生有身, 生此文王』(X VI之II/2), 殷是子姓, 任宿須句, 都是大皞之族(左傳僖公二十一年, X IV. 27), 與殷商無關, 何以要『自彼殷商?』, 不甚易解。有以爲『任』是氏, 『摯仲』是名, 當爲商王或其本家的女兒, 並以漢代以公主和親爲喻, 參看孫次舟前引文p.10. 按, 女子古時有姓無氏, 恐不能如此解釋。

(註五五) 這是竹書紀年中很著名的一條, 竹書在汲郡出土時, 這一條記載即已引起晉人注意(晉書[開明版], 束皙傳I), 自來史家也找不出可以反駁的證據。

(註五六) 史記會注考證, IV/10-11. 據說歸從他的名人有伯夷、叔齊、太顓、閔天(散宜生、鬻子、辛甲, 這些名字有的也見於尚書, 君奭篇: 惟文王尚克脩和, 我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天、有若散宜生、有若南宮括(尚書注疏[藝文版] X VI/23.

(註五七) 尚書無逸篇:『文王卑服, 即康功田功』X VI/13.

(註五八) 史記, IV/13-14. 犬戎的地點不明, 據錢穆意見犬戎原在周之東北, 即在太行滹沱之北。參看「西周戎禍考禹貢半月刊II(14/gd.)前文曾引卜辭中有關周的記載, 其中有『犬侯』, 可能即是犬戎, 伐密須

是大事，詩經皇矣篇：『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引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X VI之IV/9-12)，大約密與阮都先挑釁(孔穎達詩經正義，X VI之IV/11)，而密在涇陽縣境，阮共皆在涇水下流豐鎬附近(錢穆前引文p.2004-2005)，密邇周人首都不先併吞，難以去除心腹大患。一旦除去楊旁隱憂，周人必以為完成一件大事，因此此役戰利品『密須之鼓』，變成了周人傳世之寶(左傳昭公十五年，XL VII/11)。崇在豐鎬之間，征崇之役也頗艱難，大約崇人城守甚堅，工事也好，圍城三十日不能下，最後則斬獲頗多，詩經皇矣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VI IV/13-15)又參看左傳僖公十九年：『文王開崇德亂而伐之，崇人三旬不降』(X IV/23)，這一段詩經是中國史上第一次描寫攻城戰的記載。

(註五九) 詩經 X VI之II/23。據史記周本紀，兩國有獄不能決，來周決，(N/12-13)平毛詩傳說法也相仿，只是明指二國為爭田而求文王判決(X VI之II/23)，然而孫次舟解成爲平，實爲送質並謂非文王時事(參看孫氏前引文，p.1-12)，說甚有理，今從之。

(註六〇) 此是綿篇的續文，見詩經 X VI II/24。虞在今山西平陸縣，芮在故芮城當今日芮城縣西(參看史記正義引括地志，IV/12)

(註六一) 詩經 文王有聲『築城伊瀉，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遙追來孝。王后烝哉！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X VI之V/11-14。

(註六二) 傅斯年，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安陽發掘報告，第二輯，1930)，p.375-385。

(註六三) 尚書 X IV/3 詩經 周頌思文：『陳常于時夏』，X X之II/12

(註六四) 關於殷周爲對立的兩個民族系統，三十多年前有好幾篇名著論之，如傅斯年夷夏東西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1935)，及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徐中舒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二期1927)，說皆豐長。但『民族』『種姓』二辭，甚不宜于泛泛使用。若並無考古學及體質人類學的證據，我們最好不用易涉及種族含義的名辭。我們假定傅二先生原意是指『不同的文化集團』，而且其『不同』之處，也不過是幾個地方性文化彼此之間的差異。本文第一節已說明關中的新石器文化有其地方性，但是與東方的地方文化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我們以為周人標夏自重只是一種政治口號。

(註六五) 例如尚書召誥『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X V/6)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X VI/2)。至於文王與殷商間之關係，除政治外，顧頡剛據易經歸妹之卦，以為文王娶帝乙之妹，並以此解釋詩經大明，參看顧頡剛周易卦交辭中的故事(燕京學報，第六期1929，p.967-1006)，但顧氏以大明三章屬之二事，以為前咏殷女後咏莘女，其說頗涉穿鑿。歸妹卦辭，也可用地名釋『妹』，未必與嫁女爲一事。參看孫次舟前引文p.12-13。

(註六六) 詩經，X VI之IV/2，上帝原是殷商祖先之集合體，『天』可能是西周自然崇拜的對象參看顧立雅釋天(燕京學報第十期，1935，p.50-71)及拙稿中國古代最高神的觀念(臺灣大學文科研究所碩士論文)，

(註六七) 傅斯年，前引 新獲 p.375。

(註六八) 尚書 XI/1-22 德之觀念爲殷周之區分，參看重澤俊郎支那古代に於ける合理的の思維と展開(東京，東方文化講座會，1956)，p.2-5。又參看張光直商周文化與美術中所見人與動物關係之演變(中央研

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期，1963）p.125-130.

（註六九）史記，IV/21。據傳統說法，武王是『退而示弱』，我們不能考出武王退兵的理由，大約總是準備不夠之故。存疑。

（註七〇）詩經大明：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XVI之II/8-10。史記，IV/21-26。尙書牧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誨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巫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應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奔厥肆，弗恤；昏奔厥遺，罔父母弟，不恤。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勛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于商郊；如驅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爾所弗勛，其于爾躬有戮！」』，XI/15-18又尙書，XI/22-24，孟子，XIV I/3-4。關於牧野之戰的年份，自古推算諸說不一，相當公元前1116、1111、1070、1067、1066、1050、1047、1030、1027諸年，董彥堂先生以爲當是公元前1122年，參看董作賓 武王伐殷年月會考（臺灣大學文史哲學報，第三期，1951），p. 178。又殷曆譜 IV/15-19。Chou Fa-kao, "Certain Dater of the Shang Period" (Ha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23 [1960-61,] p. 108-133. 此事應由年代問題之專篇解決，今暫從董說。

（註七一）尙書，XI/14-15.

（註七二）徐中舒以爲彭在漢水流域，庸在漢水上游，濮亦在江漢地區，髳在漢北，但徐氏仍把羌放在隴西，仍把蜀放在四川。參看徐中舒前引文，p.150-153。錢穆則以爲蜀在殷都近畿，髳在陝縣，微即微子啟之國，或在新安，盧在盧賓函谷之南，彭在龜池，濮在延津滑縣，羌在河東近殷，不在西北。參看錢穆前引文，p. 2007-2008。按，羌之地望已見第二節，據傅孟真先生考證爲豫西山地。戰國時，四川之蠶叢，開明諸傳說與中原大殊，恐殷周之際未必與中原有如此密切的關係。雲南各族更屬山川遙隔。以前文第一節考古資料及第二節姜原所在來說，周人與國，以來自渭南以至伊洛各處者爲比較可能。

（註七三）左傳昭公十一年，XL V/18；又昭公四年：『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XL II/28。徐中舒由此引尙書及金文，以爲殷人爲防周而在黎治兵，東夷猝發以爲牽制，殷人返師東救，周遂興牧野之役。其說頗合情理。參看徐中舒前引文，p. 155-158。又參看董作賓 殷人方日譜（殷曆譜）K/61-62。

（註七四）史記，VI/26-29 逸周書（知服齋叢書版），K/2-3.

（註七五）逸周書，V/6-7。

（註七六）詩經·東山·破斧，VIII之II/1, 6. 尙書，X III/11-13.

（註七七）小臣諫殷：『白懣父以殷人師征東夷』；戴貞：『唯白犀父以成師即東，命伐南夷。』（兩周金文辭大系，東京文求堂1932）p. 13,55. 尙書，X VII/12.

（註七八）尙書多士，X VI/7-8，X VII/11-12. 白川靜，釋師（甲骨金文學論，第三集）。郭寶鈞、林壽晉，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陽東郊發掘報告（考古學報，第九期，1955）。李匪農，西周與東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p. 33。

（註七九）左傳定公四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睦

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師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續，茂葵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鐘氏、樊氏、饒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鬲之士，以供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聘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股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衛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鬲鞮、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 LIV/15-19. 在金文銘辭中又提到分封，如大孟鼎：『王曰：……嗇我其通，相先王，受民受疆土，錫汝邦嗣四伯，人鬲自馭，至於燕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錫尸嗣王臣十又三伯，人鬲千，又五十夫。』（兩周金文辭大系）p. 32-33。又有一個可能，是錫衛侯以殷舊貴族的例子：溪穀：『王來伐商邑，誕命康侯鄙干衛。齊司徒遂及康侯鄙作厥考尊彝。』（容庚，商周彝器通考〔哈佛燕京學社，1941〕，p. 42）。李亞農以爲與三代吉金文存 3.16 清伯遜作寶尊彝爲同一人，並且以爲遜卽是三監之亂後，遷殷頑民移交給衛康侯的殷貴族，見李氏前引文，p. 35, 54。

（註八〇）傅斯年，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後乃東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p. 101. 傅氏以爲燕當在今日第園城；魯當在今日魯山縣；而凡、邢、茅、胙、祭、周公諸子的封國，亦均在魯山東北，成一線排列；齊則當爲呂國，在宛南呂城，與申、甫、許、四、嶽諸姜相近；衛則在成周之北，據商舊地，與宋爲鄰。

（註八一）關於三國徙封說，參看傅斯年前引『大東小東說』。其中燕之遷徙路途最長，但也可能曾先徙封山西，然後再遷河北，參看顧頡剛燕國曾遷汾水流域考（賁善半月刊，第一卷第五期，1940）p.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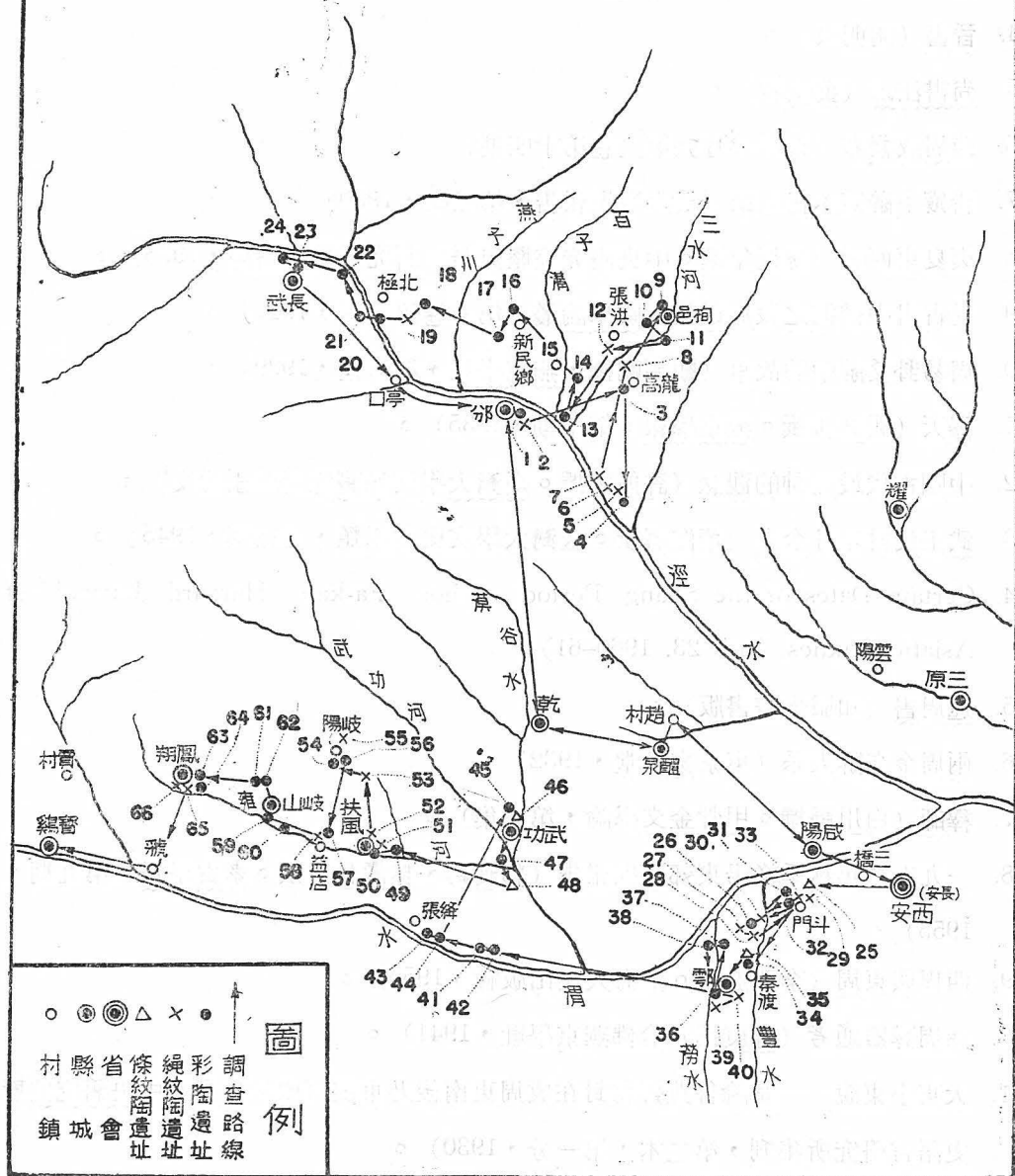
引用書目

1. 周都遺址與彩陶遺存（石璋如撰。大陸雜誌特刊，第一輯，1952）。
2. 傳說中周都的實地考察（石璋如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下冊，1948）。
3. 關中考古調查報告（石璋如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七本，1956）。
4. 西安半坡（考古學專刊〔北京，文物出版社〕，丁種第十四號，1963）。
5. 豐西發掘報告（考古學專刊〔北京，文物出版社〕，丁種第十二號，1962）。
6.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Kwang-chih Chang,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7. 黃河三門峽水庫考古調查報告（安志敏撰。考古通訊〔北京，科學出版社〕，第十一期，1963）。
8. 周都豐鎬與金文中的葬京（黃盛璋撰。歷史研究，第三卷，第十期，1956）。
9. 詩經（藝文版）。
10. 姜原（傅斯年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
11. 周人的崛起及其克商（顧頡剛撰。文史雜誌，第一卷，第三期，1941）。
12. 周人開國考（孫次舟撰。歷史與考古，第二回，1937）。
13. 史記會注考證（藝文版）。
14. 國語（天聖明道本，崇文版）。
15. 孟子（藝文版）。
16. 周都地理考（錢穆撰。燕京學報，第十期，p. 1931）
17. 殷周之際史跡之檢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二分，1938）
徐中舒撰。
18. 殷周民族鬥爭始末（吳昊垂撰。文史月刊，第一卷，第三期，p. 1941）。
19. 殷虛發掘對於中國古代文化的貢獻（石璋如撰。學術季刊，第二卷，第四期 1954）。
20. 獲白麟考（董作賓撰。安陽發掘報告，第二輯，1930）。
21. 後漢書集解（藝文版）。
22. 鬼方昆夷玁狁考（王國維撰。觀堂集林〔藝文版〕）。
23. 周易注疏（藏文版）。
24. 殷曆譜（董作賓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1945）。
25. 左傳注疏（藝文版）。
26. 論語注疏（藝文版）。
27. 西清續鑑甲編（涵芬樓依寧壽宮寫本影印）。
28. 試論湖熟文化（曾昭燏、尹煥章撰。考古學報，1954年4期）。
29. 介紹江蘇儀徵過去發現的幾件西周青銅器（汪志敏、韓益之撰。文物參考資料，1956年12期）。

30. 江蘇省丹徒縣烟墩出土古代青銅器（江蘇省文管會撰。文物參考資料 1955 年 10 期）。
31. 南京博物院十年來的考古工作（尹煥章撰。文物1959 年 4 期）。
32. 矢戣銘考釋（郭沫若撰。考古學報，1956 年 1 期）。
33. 宜侯矢戣考釋（唐蘭撰。考古學報，1956 年 2 期）。
34. 晉書（開明版）。
35. 尚書注疏（藝文版）。
36. 西周戎禍考（禹貢半月刊第二卷第十四期）
37. 新獲卜辭寫本後記跋（安陽發掘報告，第二輯，1930）。
38. 夷夏東西說（傅斯年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1935）。
39. 從古書中推測之殷周民族（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二期，1927）。
40. 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顧頡剛撰，燕京學報，第六期，1929）。
41. 釋天（顧立雅撰。燕京學報，第十期，1935）。
42. 中國古代最高神的觀念（許倬雲撰。臺灣大學文科研究所碩士論文）。
43. 武王伐紂年月令考（董作賓撰。臺灣大學文史哲學類，第三期，1945）。
44. Certain Dates of the Shang Period (Chou Fa-kao,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3, 1960-61)
45. 逸周書（知服齋叢書版）。
46. 兩周金文辭大系（東京文求堂，1932）。
47. 釋師（白川靜撰。甲骨金文學論，第三集）。
48. 一九五二年秋季洛陽東郊發掘報告（郭寶鈞、林壽晉同撰。考古學報，第九期，1955）。
49. 西周與東周（李亞農撰。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
50. 商周彝器通考（容庚撰。哈佛燕京學社，1941）。
51. 大東小東說——兼論魯燕齊初封在成周東南後乃東遷（傅斯年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一分，1930）。
52. 燕國曾遷汾水流域考（顧頡剛撰。責善半月刊，第二卷，第五期，1940）

關中遺址分布圖



(引本所集刊第二十七本石璋如先生“關中考古調查報告”附圖)